2024年6月19日，12编30卷的《江苏新文学史》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发布并召开学术研讨会。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义勤，江苏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梁勇，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中国作协副主席、江苏省作协主席毕飞宇，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副主席郑焱，江苏省作协名誉主席范小青，江苏当代作家研究中心主任韩松林，《江苏新文学史》总主编、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丁帆，江苏当代作家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王飞，江苏作协副主席朱辉、胡弦、胡学文，及国内知名专家学者、《江苏新文学史》各编主编等出席研讨，会议由江苏省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贾梦玮主持。以下为三位专家在学术研讨会上的精彩发言。

——编 者

《江苏新文学史》，丁帆总主编，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3年1月

文学史更是一个实践的领域

□孟繁华

江苏是中国的文学大省，也是强省。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研究、评论，均居国内前列。江苏文脉源远流长，有丰富的文学资源和积累，特别是百年来，江苏文学大家、名家辈出，为中国百年文学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在这样的背景下，江苏的文学研究者们在丁帆教授的带领下，撰写了《江苏新文学史》。这是一套皇皇巨作。这部文学史不仅系统地总结、描绘了江苏新文学的发展历程，呈现了江苏的重要作家作品，同时也为其他地域和中国文学史的写作提供了重要经验、奠定了基础。

我们知道，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一直存有巨大争议。特别是1985年，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写作来说是重要的年份。“现代派”文学业已落潮，相继兴起的“寻根文学”“先锋文学”，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路径。这些现象的出现，表明中国文学走向“现代”的坚定信念和大致路向，稍稍滞后的文学史写作也基本完成了对这个时代的塑造。于是，文学史家在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的一些看法，“文学史观的搏斗”在这一年相继展开。1985年10月29日，唐弢发表了《当代文学不宜写史》一文，他认为，“当代文学是不宜写史的。现在出版了许多《当代文学史》，实在是对概念的一种嘲弄……现在那些《当代文学史》里写的许多事情是不够稳定的，比较稳定的部分则又往往不属于当代文学的范围”，“历史需要稳定。有些属于开始探索的问题，有些尚在剧烈变化的东西，只有经过时间的沉淀，经过生活的筛洗，也经过它本身内在的斗争和演变，才能将杂质汰除出去，事物本来面目逐渐清晰，理清线索，找出规律，写文学史的条件也便成熟了”。因此，他主张用“《当代文学述评》代替《当代文学史》”，这样做“对于正在探索的问题，对于尚未成熟的想法，对于不断演变着的当代文学本身的发展过程，都会产生催化或者推动的作用”。

当年我们不大理解唐弢先生的说法。比如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这是一部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教学基本格局的巨著。他写作这部巨作的年代，“现代”刚刚成为过去，从某种意义上说，王瑶先生的文学史就是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王瑶先生可以这样书写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为什么不可写史？多年后我们才理解了唐弢先生的良苦用心。这就是，当代文学史涉及或牵扯的因素太多。即便在本学科范围内，对当代文学史写作的争议或诟病也一直存在。这一现象从另一个方面表明，任何文学史的写作都是一个建构的过程，它的不确定性使它永远都是一个“未竟的方案”。

但是，时至今日，据不完全统计，已经出版的各种当代文学史著作已经100余部，而且还有出版社在组织编写。这种情况业已表明，中国当代文学史已经不是可以或不可以写的问题，而是怎样写的问题。它的争论已经过渡到了实践阶段。《江苏新文学史》的出版，就是文学史写作具体实践之一种。该书序言说：“在中国新文学诞生100周年之际，组织编撰一部具有全面性、系统性、学术性、权威性的《江苏新文学史》，科学梳理江苏新文学百年来的发展脉络，系统回顾总结江苏新文学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历史经验，为江苏百年新文学的研究留下一部具有宝贵学术价值、历史价值和应用价值的地域文学史，同时也为中国新文学史提供更为完整丰富的史料，彰显出江苏文学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突出贡献，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文化史意义。”

《江苏新文学史》上起1892年，下讫2019年。全书凡12编30卷900多万字，共涉及作家3419位、作品13107篇（部）。其中，文学思潮与批评编2卷、小说编6卷、通俗文学编2卷、诗歌编3卷、散文编3卷、报告文学编2卷、传记文学编2卷、戏剧影视编4卷、儿童文学编3卷、世界华文文学编1卷、网络文学编1卷、文学报刊编1卷。同时，还配套编辑了《江苏新文学史史料选》40卷1300多万字。我曾参加过《江苏新文学史》项目的评估。《江苏新文学史》以晚清至民初的江苏文学为起点，对“五四”江苏文学展开论述，更加凸显了文学史的连续性和必然性，具有非凡的历史眼光。《江苏新文学史》“厚古不薄今”，增设电影电视剧卷、网络文学卷、世界华文文学卷和儿童文学卷等，极大地丰富了江苏地方文学史，同时也为中国百年文学的架构提供了重要参考。书中还提出，文学的发生与来源不尽相同，例如世界华文文学，如何在统一的框架下，将庞杂的文学支脉放入文学史这一整体当中，也是一项挑战。

还值得注意的，是这部文学史中的“大江苏”的概念。地方文学有一个问题必须要处理，那就是：“本地作家”都包括谁？《江苏新文学史》的处理方式是，以“籍贯”为重要参考。只要籍贯是江苏的，就是江苏作家。比如汪曾祺，1920年3月5日生于江苏省高邮市，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毕业考入江阴县南菁中学读高中。1939年夏，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50年，汪曾祺任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北京文艺》编辑部“辑稿人”，大约是今天的“编辑部主任”。或者说，汪曾祺19岁以后，基本就没在江苏工作过。但《江苏新文学史》把汪曾祺作为最重要的江苏作家和研究对象。再比如格非，江苏镇江人，但他没有在江苏的工作经历，还有年轻作家魏微，除了在南京大学作家班学习过，几乎也没有在江苏工作过，但她也是江苏籍重要的文学力量。

第二点，是《江苏新文学史》对“事件”与“本体”的处理。对文学史已有的成果，有的学者提出文学史的“史学化”问题，认为文学史过多地关注了历史、轻视了文学。这种看法还认为，在文学史中不宜过多地书写历史事件，而要更多地讲述文学史的“本体”，也就是作家和作品。这种情况比较极端的例子是鲍鹏山的《中国人的心灵》，这是一本非常感性化的中国文学史，通过上自《诗经》下至《红楼梦》的数千年中国文学名家、名作的再解读和诗意感怀，试图深入中华民族的内在心灵与思想，展示这个民族三千年的理智与情感所系。因此，这是一部特别有探索性的文学史。但是，任何文学都不可能脱离时代而独立存在，如果离开具体的历史环境，对读者接受和理解文学作品必然会产生一定的障碍。那么，如何处理文学史的“事件”与“本体”关系，对文学史家就是一个重大的考验。我觉得《江苏新文学史》在这方面处理得恰到好处。这也是因为总主编丁帆先生和各卷主编以及所有参加编写的学者都有非常好的文学史写作训练，有丰富的文学史写作实践经验。我非常感佩江苏的学者能生活在江苏的土地上，这是一块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土地，这块土地上必然要绽放出绚丽的文学之花。作为全国的文学大省、强省，江苏还会为中国文学作出更多的贡献，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作者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监事长、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为文学史书写开一扇窗

□贺绍俊

有一天，快递员用小推车送来一个大包裹，打开一看，是一套30卷的《江苏新文学史》，它就像是一颗文学的“重磅炸弹”，真把我惊异到了！这些年来，相继有好几个省的作协都组织编写了地方文学史，我也都读过，但当我翻阅了这部新作后，明显感觉到，最具学术性、最扎实、最有规模的还是《江苏新文学史》。

江苏作协一直具有及时总结经验、积累史料的自觉意识。早在2014年，江苏作协就成立了“江苏当代作家研究中心”，该中心一成立就进行了“江苏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的编辑工作，后来又有了“江苏当代文学批评家文丛”“江苏青年批评家文丛”等出版工程的实施。这一切其实都是在为《江苏新文学史》作准备，这个准备无疑已经非常充分了，因此，《江苏新文学史》的问世完全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

《江苏新文学史》的学术性很突出。全书体现了一种发展的、与时俱进的文学史观，充分吸纳新的文学事物、新的文学现象，并努力把握文学在未来的走向。如将通俗文学、戏剧影视、网络文学均吸纳进来，重新评价通俗文学的价值和地位，特别是将江苏新文学的起点确定于通俗文学上（韩邦庆1892年发表的《海上花列传》），这就意味着新的文学早在清朝末年就酝酿成形了。此外，还有一卷专写报纸期刊，这无疑是在学术性上的一个很有价值的抉择，说明编写者看到了新文学与现代期刊的密切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新文学就是在现代期刊的基础上诞生的。

学术性还体现在对被遮蔽、被忽略的文学作品、作家和文学现象的重新发现，如“新四军根据地文学”等。特别是在重新评价“探求者”事件上，可以看出编写者秉持学术精神的严肃性和公正性。上世纪五十年代，叶至诚、陈椿年、高晓声、方之、陆文夫等作家创办了同人刊物《探求者》，虽然办同人刊物在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件十分寻常的事情，但这在新中国成立后还是非常罕见的，江苏作家一方面想要承续现代文学的传统，另一方面也想通过同人刊物倡导自己的文学主张，以此呼应“百花齐放”的文学方针。但这一事件很快遭到了批判，这些作家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不公正待遇。编写者不仅客观详细地记述了“探求者”事件的前后经历，而且也探讨了“探求者”为什么会遭到严厉批判，并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了认真反思，从而得出结论：“这些江苏作家的出现，表现出江苏文人开放包容、敢为人先的思想魅力，以及临难不苟、勇于担当的精神。”这样的结论，建立在客观的史实基础上，体现出一种发展的历史观，往往是一部文学史中闪光的部分，在《江苏新文学史》中，类似的闪光部分仍有不少。

这部文学史在论述中注意挖掘江苏地域文化对作家创作的影响，重点分析了江苏作家身上的地域文化气息，比如，“江南士风”被作为一个描述江苏地域文化特征的概念，贯穿在各类文体的论述之中。又如在散文卷中，编写者归纳出江苏散文的两大传统：一是言笑晏晏的士大夫雅文化传统，一是清新朴茂的民间俗文化传统，编写者紧扣这两大传统，论述了江苏散文文质彬彬的文化属性、古典与现代整合的审美范式和典雅蕴藉的文采风流三大总体特质。

《江苏新文学史》虽然是自近代以来一百余年的文学史，但编者将更多的篇幅留给了当代，而且分量最重的是21世纪之后的当下，这明显表现出编写者执行了一条“厚古不薄今”的编写原则。我以为执行这一原则是非常合适的，作为江苏作协组织编写的一部文学史，应该具有服务当下文学现实的考虑，通过文学史的编写更好地总结文学现状，从而能够将当下的文学置于文学史的系统中进行考量。既然执行这一编写原则，对于当代文学，不妨就可以详细一点、充分一点，这就要求这部文学史具有较大的容量。现在《江苏新文学史》共有30卷，最初拿到书时我还带着疑问，为什么要编这么大的体量？后来读了以后才觉得这个体量并不大，也只有这样的体量才能更好地达到“厚古不薄今”的目的。文学史书写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做筛选，通过筛选让真正的文学经典留存下来。但是筛选是一个时间的过程，时间给筛选的准确性提供了有力的保证。然而当代人写当代史，显然缺少了时间的保证，要进行筛选就具有很大的难度。至少还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修史者慎重对待：一方面，修史者就是史中人，宛如“身在此山中”，便“难识庐山真面目”；另一方面，当代文学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它仍在向前发展，很多作品的经典化尚处在襁褓之中，难以作出准确的判断。凡此种种，研究文学史的学者面对当代特别是当下的文学就会变得非常谨慎，因此也曾有学者断言，当代不能修史。这次读《江苏新文学史》深受启发，我觉得，江苏的同行们通过这部文学史的编写，为当代人如何写当代史提供了一条较好的途径。这条途径概括起来说，就是不把筛选作为首要任务，而是立足于为未来留下最有价值、最有分量的印记。出于这一目的，就需要给当代以及文学现场提供更多的篇幅。同时，当代部分的编写者们还能够充分吸收文学批评的成果，有效地将文学批评、学术研究和文学史书写融合起来，加强了文学史的当代意识。

必须看到，这部文学史是由江苏作协组织编写的，它和一个学术机构或高等院校的文学专业进行编写的文学史还是有所不同的。作家协会是作家的联合体，成立作家协会是为了繁荣文学创作，1953年中国作家协会拟定的章程就明确规定：“中国作家协会是以自己的创作活动和批评活动积极地参加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的中国作家和批评家的自愿组织。”现在我们才发现，原来作家协会也是能够进行文学史的编写工作的，江苏作协等以自己的实践，拓宽了作家协会的职能，为作家协会如何深化自己的学术性提供了建设性的途径。作家协会参与到文学史的写作中，是为文学史研究界增加了一份新的力量。文学史研究界应该热情欢迎这一新力量的加入。我是从作协系统进入到大学做学术研究的，我常深感学术研究过于封闭，脱离文学现场。我主张要把文学批评引入到大学的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之中，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的学者应该积极参与文学批评，让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有机结合起来，这样就能克服文学研究脱离文学现场的毛病。《江苏新文学史》给文学史书写带来了一股新的气息，这股新气息是什么呢？如果说以往的文学史强调的是一种封闭性的系统，而《江苏新文学史》则是要开一扇窗，与文学现场形成开放性的交流。

（作者系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重温江苏现代散文

□孙 郁

地方性的新文学史写作，提供的往往是主流文学史没有的另类视角。比如，东北文学史，就是远离中原文化的野性的气韵，体例也是不同于一般著述的，而浙江的文学史，大约是另一种风景，大师云集里，看出中国文学的高峰所在。如何写好文学史，有一定的难度。我自己对于民国散文有点兴趣，但相关文章，迟迟写不出来。近偶读《江苏新文学史·散文编》，发现里面处理那段时光的人与文，体例和风格，别是一种韵致，读起来很有趣味。作者用“过渡时代的新型散文”“多元共生的散文新时代”“散文文体成熟期”“散文文体的新变”串出一系列作品，其中提供的群像和审美花絮，有些是过去很少看到的。

没有料到，现代散文作家的重要人物，有许多都是江苏人，他们几乎占据了新文学史的小半天地，气象不俗。这里有一连串的名字：王韬、柳亚子、叶楚伧、吴稚晖、刘半农、陈源、朱自清、叶圣陶、傅雷、叶灵凤、钱锺书、吴祖光、陈白尘、路翎、汪曾祺……而像汪曾祺这样的作家，在今天的散文界已经是难以超越的大家了。

现代散文出现之前，士人散文和通俗作家的闲文值得注意。近现代江苏人才辈出，许多地方性的人物也有全国的影响。作者论述王韬、柳亚子、叶楚伧的政论文，让我们看到白话文之前的辞章之迹，可回味的地方很多。促进章法变化的，大抵是学术思想的变迁，以及通俗文学浪潮的冲击，前者推动了观念的变化，后者主要是多了游戏笔墨和反雅化的俚曲小调，对于士大夫之文可谓一种消解。李伯元、李涵秋、范烟桥都有不错的文章。这些江苏的近代作家领时代风气，讽刺、娱乐之间，散出一种新式社会关怀。研究后来的文章演进，我们一般不太注意这些，现在想来，是要补上这一课的。

这部散文史对于民国文人的写作与学术思潮的关系，颇多心得，兼顾到学术史与文学史的脉络。比如谈及吴稚晖，就注意“理论家的眼光和思想家的底子”，并概括其文章的特点是“野”与“邪”，从中可以看出审美的一种脉络。言及刘半农的“游戏文章”，也考察他与学界之关系，以及传统士风如何影响了其嘲讽笔墨。其中“从洋场才子转化为现代知识人的过程”，体会颇深。作者还描述了陈源的随笔，对于《西滢闲话》的介绍则注意到思辨气中“冷静、清澈”特点，模仿法朗士“在讥讽中有容忍，在容忍中有讥讽”的一面，被再次强调出来。这几个人的文本，在现代文学史上只是一笔带过，评价也并不高，但他们提供的思考并不小。如果要梳理散文何以成熟，这几个的得失，对于今人都有不小的启示。

江苏近现代以来学者甚多，朱自清、叶圣陶、顾颉刚、魏建功、傅雷、钱锺书都是学术上颇有创建的人。他们的写作对于新文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些人的写作背后，有着一种学术思潮的推动。比如顾颉刚《游妙峰山杂记》，和民俗学的提倡有关；魏建功在《语丝》上的随笔，也是呼应歌谣研究的沉思；徐祖正《山中杂记》则暗袭了周作人的某些观念。至于郑逸梅则让人想起明清笔记，闪光之处在于作者的杂学。而最为聪慧的文字当然属于钱锺书，“以专业知识导向常情常理”，不了解背后的学术资源，自然不易清楚其文脉的起承转合。所以，我们看江苏人在民国期间的散文书写，新旧学术的交汇是不能不提的。

朱自清和叶圣陶的短章，对于现代白话文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他们都懂得旧学，也翻译过域外作品，彼此的词语实验都很长，留下的心得值得研究。朱自清自称是“素人”，写作的范围也较为狭窄，但因为精神的细腻和诗意的真切，婉转的叙述里常有动人的笔触。《背影》寥寥数笔，写出父亲的可亲可爱，泪水暗含在文字中，幽微里散出广大的暖意。《荷塘月色》乃静谧的夜话，心绪的广远和幽思的深厚，都渗在清词丽句里。《女人》《白采》《说梦》都有独白的真切，柔和的细节输送着自己的坦然，他的那些怀人的文字都有自我的内省情绪，连带出对命运不可知的喟叹，遂流出精神的纯洁。叶圣陶的文章和朱自清在一种类似的文脉里，有温润、平和的一面。不过因了阅世之深，所以不都是象牙塔语，内蕴比朱自清开阔了许多。和京派作家比，不及废名玄奥，却多了废名少见的冷峻眼光。在审视民俗与社会时，五四时期文人的批判意识随时可见，但又带着某种宽容和微笑，故文章有柔软、和煦的意味。《未厌居习作》乃叶氏早期散文的代表，视野里多平民的苦乐，深味世俗的冷热，文明批评隐含在许多笔致里。不过他的笔触也有另一种静谧的美意，《两法师》系作者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肃穆里的美和心绪的安宁于此流出，洁净之美是此文的妙处，人物神态与境界在传神的笔触里自然飘来，阅之心神一动，似乎得到神意的洗礼。弘一法师的谦逊之美，印光法师的庄严之气，以及他们精神里异样的超然都栩栩如生，真俗之辨也于此得以显示，真真妙文者也。

用地域性标志来统一观照他们的写作，会带来一种困难。《江苏新文学史》的写作者意识到了这一点。虽然差异很大，但背后的学理深厚，影响了他们的精神走向，这大约是一致的。作者写道：“江苏地处中国东部，不仅地理风貌与南北各省存在较大差异，就居民的文化性格而言，简言之，大概可以算是较为中和，不太容易走极端。由此，侠义的随笔在江苏散文中的地位要超过杂文，不过，瞿秋白的杂文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这一状况。瞿秋白具有深厚的学养，而且早年在苏俄采访的工作经历和曾经一度从事实际政治活动的人生阅历也使得他具有洞悉世俗的敏感，所以杂文创作的整体水准很高，这使得江苏散文在杂文领域取得了具有标志性的突破。”是的，我们对比一下瞿秋白与朱自清、叶圣陶的作品，文气与章法都有所不同，这除了气质之外，与各自知识结构的差异也是有关的。阅读瞿秋白，不能不了解他对于马克思、列宁的思想的摄取，还有早期苏联的文化理念，这些都冲刷了他的士大夫旧习，使他完成了从柔弱书生到革命者的转化。我们看《赤都心史》《饿乡纪程》，当感到其间的冲荡之气，而杂文《王道诗话》《最艺术的国家》《透底》《关于女人》《真假唐吉诃德》《大观园的人才》，则大有鲁迅之风。若说理论家有质感的文章，瞿秋白是很重要的代表。

如此众多的作家，一一陈述并不容易，借助学术史的背景考察文章的起落，是不错的思路。比如描述钱锺书，就梳理出知识结构里驳杂的元素，其中不乏智性之乐。介绍傅雷的篇章并不用流行的笔法，而从“非文学性中的文学性”看其散文的价值。傅雷从法国文艺思潮悟出美的灵光的不同出处，涉及泰纳、塞尚、萧伯纳、罗曼·罗兰的文章，都有妙意。作者认为傅雷的文学评论也属于学者散文的一种，“但他与朱自清、钱锺书等人的区别，在于后者是自觉地从事散文写作，而他只是自如地写出个人见解，却不期而然地造就了一种散文风情”。

这种散文理念，空间显得更广，与流行的看法多少不同。将学者的笔记、评论、题跋都置于散文世界，和传统的文章观念便有了交叉，视界也开阔了。散文有不同的路径，烟火气的素描可见世间风情，而学人的笔记则牵出学术灵光，描述他们总还是要有不同的侧面。从江苏的民国作家散文写作看，诸多佳作的出现与现代学术转向有关。从“国语的文学”到“文学的国语”乃启蒙思想的闪动，刘半农的翻译经验的内省，叶圣陶的辞章观念的自觉，还有钱锺书“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理念，都折射着一种开放的智性。

我觉得这是文学史写作不能不注意的方法之一，法国学者保罗·梵·第根在《文艺复兴以来的欧美文学史》一书中，就多带此类意识，每一章都能够感受到作者对于学术思潮如何渗入到文学思潮的用心。比如谈及近代现实主义写作，便指出历史学方法中的科学因素、博物学和考古学的传播对于作家的影响；言及现代散文则能够指出，这个时期创作特点是受了尼采、柏格森、爱因斯坦、弗洛伊德的诸多暗示。将文学史置于学术史的背景下加以描述，不妨说是一条有趣的路径。《江苏新文学史·散文编》的现代文学部分，也运用了这类方法，读起来仿佛重温旧迹。由此而感到，没有学术观念的变迁，便不会有民国散文的进化，这个话题，值得接着说下去。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